

QUANMIAN
JIAN SHE
XIAOKANGSHEHUI
YUREN DE
QUANMIANFAZHAN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与人的全面发展

胡大平 姜迎春 郭榛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项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与人的全面发展

胡大平 姜迎春 郭榛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胡大平,姜迎春,
郭榛树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

ISBN7-214-03949-4

I. 全... II. ①胡...②姜...③郭... III. 小康—
建设—研究—中国 IV. 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227 号

- 书 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著 者 胡大平 姜迎春 郭榛树
责任编辑 左 衡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淮安楚州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页 1
印 数 1—3075 册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949-4/F·768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言

侯惠勤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所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它紧紧地抓住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一大思路,全面回答了在新的世纪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历史性课题,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复兴和推动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伟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指明了方向。

在研究、宣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应该首先把握其精神实质。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博大精深,也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不过,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入手,首要的问题都是要把握其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与时俱进这一重要特征。胡大平等几位同志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把落脚点放在执政为民上,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思路。这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对历史前景所作的科学预言,而且正在为当代实践所证明,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一个支撑点。综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建设新中国到改革开放,虽然其步骤和道路与经典作家的预言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其根本目标却从没有离开过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这一原因,随着物质基础的一步步强大,我们的具体建设目标也就越来越贴近人的全面发展,从现代化到小康再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就这样一步步体现的。因此,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道路,在这一道路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又始终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创新。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重复概括了,乘这个机会,我专门谈一谈如何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出的理论创新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执政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①创新是多方面的,而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在于理论创新。中国现代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在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首先是理论上的先进性。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不断地形成相应的理论成果,是党具有蓬勃朝气的表现。“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理论创新之所以必需,就在于现实总在不断地变化;理论创新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面向实践的开放体系;理论创新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居安思危、忧国忧民。因此,领悟“三个代表”思想的创新性,必须具有忧患意识,着眼于其对于变化了的现实的理论透析。由此看来,“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准确地抓住了党的建设所面对的新变化并作出了新的回应。

首先,党的领导的合法性的变化。无论过去或现在,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自己领导权的可靠保障,是获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的合法性根据。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展和文化问题。在革命年代,代表人民利益只不过是现有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没收官僚资本归全体人民等);在“冷战”时期,代表人民利益也主要是拒腐防变的问题。然而,在今天,代表人民利益已不仅仅是不损害人民利益、在现有利益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公平,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发展不断地扩大现有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仍然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说,在今天,经济和社会发展已具有重大的、甚至是首要的政治意义。

同样,在革命年代和“冷战”时期,文化只不过是完成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手段,是革命大军的一个方面军,正如列宁所形象比喻的,是整个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从总体上看,革命的凝聚力在当时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和不断获得胜利的政治斗争,而不是靠文化。然而,在今天,一方面,文化已成为人们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主要来源,尤其成为团结和教育青少年的主要方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如果缺乏文化吸引力,即便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也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文化的创新、超现实和个性化的特性,又使得处在和平建设时代的执政党,要成为文化创新的代表变得十分困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就是一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源,以构筑国民的特殊身份和民族认同感的话,就无法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甚至连爱国主义的旗帜也难以坚持,更何谈坚持党的思想领导权!因此,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已成为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重大挑战。总之,在今天,不是一个代表,而是三个代表,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权的合法性。

第二,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的变化所导致的领导方式的变化。无论过去或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阶级性质不能改变,否则,它就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内在根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现有的全部社会力量中,只有工人阶级没有本阶级的既得利益、且其代表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而能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长久地保持一致、并带领他们前进。但是,在今天,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剥削阶级的基本消灭,使得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空前加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又使得我国的社会分层和流变空前活跃、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空前模糊。由于科技和知识创新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大量传统产业就业人员的减缩,由于非公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及领导地位,以及非公经济创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社会属性问题,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争论焦点。显然,无视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借此而否定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三个代表”为我们在变幻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树立了一个判断社会先进性的客观标准。

不能否认,在今天的中国,有利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绝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经济形式绝不仅仅是各种公有制形式,而是包含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社会力量在内。但是,只要最终形成既得利益,就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上也必然有不可逾越的禁区、并最终与之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先进性的分析(无既得利益、有阶级意识)并没有过时,从本质、趋势和联系的总和看,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但是,另一方面,在我国今天,不但工人阶级的数量、构成、阶级特征等发生了很大变

化,而且它和其他社会阶层的联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说到底,工人阶级今天是领导阶级、共产党今天是执政党,它必须将各种利益冲突限制在制度范围内,不致出现制度外冲突的社会分裂。

如果说,在阶级斗争为主的时代,党的领导方式表现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间进行抉择,分清敌友我是首要的问题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的今天,党的领导方式就必然地转变为“制度整合”。就是说,把日益分化的多元利益、以至于存在某种对立的利益冲突,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加以解决,即“合法反对”原则。这是稳定大局、加快发展、长治久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实现这一原则的前提,是现行体制必须能够包容一切社会阶层,关键是赋予它们以同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把包括私人企业主在内的各个新社会阶层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允许私人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成功进行制度整合的力作。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能有效地整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看不到这一变化趋势,就会陷入自我孤立的宗派主义,而最终导致边缘化。

第三,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及建党大思路的探索。无论过去或现在,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党的任务和内外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立于历史潮头、带领人民前进的现实保障。在今天,党所面临的崭新历史条件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和我党的长期执政,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存在若干不确定的因素。它致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样双重考验。“三个代表”思想为解决上述历史新课题开辟了新思路,提出了建设一个学习型的党,以努力跟踪并不断站在历史的潮头。它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客观尺度和实践纲领;它开拓了以发展和创新为内核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境界;它把学习和学风摆到了首要地位,借以跟踪并驾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它把加强和改善党的作风建设作为突破口,借以塑造党的良好形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关系。这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形成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之本在保持其先进性这样一个大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无论何种形式的创新都有原创性、开拓性和除旧布新的含义,然而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创新,却又各见特色。现在人们往往将熊彼特关于“创新即破坏性的创造过程”这一界定无条件地加以套用,因而造成了一些有害的倾向。一些人误认为创新必是以“破”为基础,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理解中,总爱着眼于“老祖宗”没讲过、没想过、没做过的观念,并以是否与“老祖宗”所讲、所想、所做不一样作为判别其创新性的标准。其后果,一是导致离经叛道、丢弃老祖宗,另一是厚古薄今,剥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这或许就是现在人们对于包括“三个代表”思想在内的认识评价不很一致的思想根源之一。

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之所以不能片面地强调“破”,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的“工具”(而知识、体制、技术等等则主要是工具),而且是我们的“信仰”。尽管信仰的类型很不一样,但其共同点则在于都以绝对存在和绝对真理为对象。黑格尔正是抓住了这点来调和宗教与哲学;费尔巴哈虽然与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不同,但也承认绝对事物的存在,只不过强调宗教是“从绝对引申出相对”,而

新哲学则是从“相对引申出绝对”。大家也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决不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因此，任何信仰总有一以贯之的思想灵魂、恒定不变的价值追求。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尽管它不同于别的信仰类型，而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但作为信仰，它也就必然同时具有一脉相承的信仰特征。否则，它就不能凝聚人心，形成合力。邓小平把这个意思简要地概括为“老祖宗不能丢”；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继承和发展不可分割的统一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无疑地包含着修改某些具体观点、放弃已不具操作意义的纲领和策略、增添某些新语言、新观点、新思想等含义，但决不限于此。我们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创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继承和发展相统一。我们在前面讲过，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依靠先进思想和先进社会力量的指引。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殷殷期盼才能真正变成现实。因此，从根本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其表现方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由于实践总在不断发展，历史总在不断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实际地存在并产生影响力，就必须不断地面对变化了的新情况，有针对性、有选择

地重申和坚持某些理论观念,并作出新的阐发。可见,任何对于理论的有效坚持,都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继承和发展两个部分,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

邓小平在回答国际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疑惑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①事实也正是如此。邓小平在“文革”后针对当时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现状,努力恢复和倡导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其不仅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而且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三个代表”思想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始终存在着推动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两大社会力量、两种社会利益和两条现实道路的分析,运用到方向感严重迷失、社会分层和阶级关系相对模糊的当代,树立了辨别先进和落后、健康和腐朽、正义和邪恶的当代坐标,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解释力和说服力,因而无疑地具有理论创新性。

第二,批判和建构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当然更离不开批判。所谓批判,并非单纯的破坏和否定,而是一种科学精神和辩证眼光。比如,从变化、发展中把握和认识一切事物;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流行的、统治的观念中揭示其历史根源和历史界限;从生活和实践的变化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必定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批判世界和自我批判的统一。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把意识形态批判视为无谓的争论,当然更谈不上承认其中的理论创新。实际上,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精神支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和现代工人运动;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党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语)。而一切企图削弱以致消解中国共产党的敌对势力,必然力图以各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由于此种意识形态的渗透、颠覆总要利用“时代特色”和“学术创新”的渠道,因此对其的有效抵制、批判就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念,而且需要理论创新。大家所熟知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就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批判密不可分。而邓小平理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通过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从而在民主、人权、理想、信念、现代化等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实际上也是针对西方进行分化、西化的图谋而作出的回应,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新世纪继续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这一历史性课题。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决非单纯的自我辩护,而是在努力运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充分说理、解剖对手的同时,严格地自我审视。这样,意识形态和科学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中达到了统一,而坚定信念、发展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批判的必然结果。

第三,解释现实与超越现实相统一。理论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在于它能够合理地解释实践提出的课题,而当其无法有效地包容实践新课题时,便出现了理论危机。然而,解释现实有两种情况:一是立足于观念自身的逻辑,通过变换观念来解释世界。“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

认它。”^①——是立足于现实自身的逻辑，通过揭示这一逻辑的趋势超越现实。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决不表现为新术语、新名词的铺天盖地，更不表现为通过这些名词、术语的运用来承认现状（无可否认，今天确实有人在通过不断地制造新名词以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而是借此不断地引导人们去改变现状。

这样，我们衡量真正的理论创新的标准就不在于新名词、新术语的多少，而在于其综合方式所新拓展的历史容量。关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划分，在列宁那里已有明确阐述，然而当毛泽东作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概括时，就赋予了这种划分以新政治内容和时代内涵；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或初级状态的思想，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毛泽东那里就有，然而当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概括时，不仅涵盖了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前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将其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据的基本国情，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三个代表”思想的最新概括，拆开了似乎都是熟知的观点，然而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却科学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难题，从而成为新世纪党建伟大工程的纲领。总而言之，从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出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我们就能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保持党的旺盛活力。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广大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的研究、宣传和贯彻方面肩负着重要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6 页，人民出版社，1995。

任。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知识分子都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自觉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创造新的业绩。”^①这个指示对于广大青年理论工作者尤为重要,因为未来意识形态阵地要靠他们坚守,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要靠他们来创建。因此,我非常支持胡大平、姜迎春、郭榛树三位同志写这本书。这几个作者,都是我的学生,通过多年的勤奋学习,现在都已经成长为高校的青年学术骨干,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新生代。读者们将会看出,虽然书中仍可能存在着一些稚气,但总体上已经充分体现他们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清新明快的理论风格。对此,我备感欣慰。我相信,经过进一步的磨炼,他们必定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①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第28页,人民出版社,2003。

绪 论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这一指示，既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定位，又是学习、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方针。从这三个定位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既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又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特征。因此，从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既要有机地照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历史环境和任务，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作为这种结合的第三大理论成果，其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①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第4—16页，人民出版社，2003。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这两个贡献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属性——既是一门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又是改变世界的纲领,并且以新的历史实践丰富了它的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它就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是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这种科学在理论上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之谜,因此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它是改造世界的纲领,这种纲领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科学地指明了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是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科学依据和指南。正是这一原因,它有效地指导了包括“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历史的检验,同时,亦通过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结合而得到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这种探索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精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从而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理论并带领中国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迎来民族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探索过程中,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的思想成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新实践的概括,全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又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大历史突破。这一历史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实践品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它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因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理解、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可以从总体上进行,也可以从局部入手。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入手,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视角。为什么选择这个视角呢?从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阐明,共产党人实践的最终目标便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社会他们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从历史发展的形态看,则是以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①在实践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领导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还是长期执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把马克思主义

^① 在这之前,分别是以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6—108页,人民出版社,1995。